

往事回顾

艰苦的历程

刘石山

兰州战役结束后，我军稍事休整，即挥师北上，奉命向宁夏进军。在八百里征途途中，广大指导员发扬了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克服了种种困难，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

吃麦粒

一九四九年九月七日，我一八九师为六十三军的第二梯队，在一八七师后跟进，沿兰(州)靖(远)公路向中卫方向前进。

西北高原，地瘠水缺，人烟稀少；加上马鸿逵的长期盘剥和掠夺，沿途村庄，断壁残垣，劫后惨景到处可见。第一梯队征粮就相当困难，我们是二梯队就更难了。九月十日，部队从兰州出发时带的粮食吃完了。再向前走，就买多少吃多少，买什么粮就吃什么粮，买不到就不吃。有的连队一天也难吃上一顿饱饭。即使买到粮食，很难找到磨，没法加工成面，也来不及加工，只好吃整的粮食。买到小麦吃麦粒可就难了。煮的麦粒，开始吃着还挺香，一顿饭没吃饱，就受不了啦。牙齿、耳朵根、太阳穴都是疼的。有的同志干脆嚼不烂就咽，吞饱肚子拉倒。就这样，一连四五天，天天是煮麦子、炒麦子，有的同志嘴里磨起了泡。但是，为了消灭马家军，解放宁夏受苦受难的人民。吃这点苦算什么呢！所以，谁也不叫一声苦，喊一声累，有的同志还编了顺口溜：“地上雨水起水泡，嘴里吃麦磨血泡，两只脚板泡连泡；步兵人人都有炮(泡)，定把马匪歼灭掉。”

不进清真寺

塞外，秋雨绵绵，西北风时大时小……

战士们冒雨行军，衣服早湿透了，多么盼望着早些到达目的地找个房子避雨，暖和一下身子啊！但是，在那荒芜的大草原和山区，哪里有那么多的村庄呢！有时二三十里路遇上个村庄，多说不过十几户人家。部队行军，全是几百几千人一起行动，要都住上房子是根本不可能的。有的同志自兰州出发以来，还从来没有在房子里住过一夜呢！九月十三日，五六五团经一天冒雨行军，好不容易到达了甘(肃)、宁(夏)山区交界处的一个村庄，名叫白沿口，是前走40里，后退40里唯一的一个村子，全村6户人家，有十几间破房。全村1000多人怎么住呢？热情的老乡腾出了几间房子，他们先把病号安排了进去，其余的部队只有在统一划分区区域的树底下，墙根下，山洞里，山崖峭壁下，随便用东西遮一下雨，就背靠背坐着休息了。二营四连的休息区里，有一个清真寺，别的再没有什么可以避雨的地方了。但是，他们坚决执行回民守则，宁愿在寺外淋着，也不进清真寺，冷的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挤在清真寺的房檐下，就这样度过了一夜，没有一个进清真寺的。当群众看到这情景，无不称赞，都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好队伍。”

睡“沙床”

十八日傍晚，落日余辉，映红西边天际。五六五团到达黄河南岸，奉命就地宿营待命。这里一面是起伏连绵的高山，一面是湿河滩，前后左右十几里路没有一个村庄，就连干草也很难找到。山头上风大天冷不能睡，背风的斜坡上哪能睡住人呢？唯一平坦的只有湿漉漉的沙滩。战士们从山丘上取来干沙子(山丘上的沙子是北岸大沙漠里刮来的)，铺在地上，就睡在上面。但是，刚睡不久，风起沙飞，弄的战士鼻子耳朵里到处是沙子。同志们又起来，在地上挖个坑，再铺上干沙子，造成了一个个的沙床。在这世上稀有的沙床上，同志们望着闪闪的星星，伴着黄河的波涛声度过了一个塞外难忘的夜晚。

何老之风 高山仰止 (二)

张树林

何老一生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像这样的战斗实例，在回汉支队和宁夏人民解放军期间还有许多。

西征期间，作为一名随军的地方工作干部，何老忠实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土地政策，工作处处深入实际，体察军情民情，办事公正无私，而且发现错误就马上纠正。一次在安边县的石洞沟，由于调查了解不够细致，误将一家中农打了土豪，群众议论纷纷。为了保护政策，挽回影响，他们召开了全村的群众大会，给那家农民赔情道歉，赶着牛羊退还了实物，受到群众称赞。

在宁夏的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何老是被党中央最早派遭到宁夏的地下工作者之一，也是坚持在宁夏搞地下工作时间最长、经历最多的人。为了适应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形势，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领导各族各界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决定派干部到马鸿逵统治的宁夏地区开辟工作。1937年11月，从中央党校少数民族工作干部班提前毕业的何广宽和李维钧、薛天敏等同志一起，随同新组建的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仰南，先后从定边来到宁夏省城(今银川市)。到宁夏后，何老暂住南门外三顺店，以卖书报为掩护，与其他同志一道以省城为中心，往来于中宁、吴忠、平罗、石嘴山之间开展工作。何老与民主人士雷启霖、袁金章、李冲和等，都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何老动员雷启霖出来工作，为宁夏人做事，并到贺兰山察看地形，以备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9月，因马鸿逵的特务盯梢，李仰南指示何老回到边区，被三边分区留用，先后任盐池县三区区委书记、中共盐池县委常委兼统战部长、盐池县政府民族科科长、盐池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等职务。

1942年9月4日，为了进一步开

展党对宁夏的工作，中共三边分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金(积)灵(武)工作委员会，又称河东工委，代号ABC工委。由何广宽任工委书记，许宗岳、江云分别任组织、宣传部长。工委成立后，一是对宁夏国统区逃到边区的移(难)民、逃兵进行妥善安置，帮助解决各种困难使其安居乐业，通过他们广泛宣传共产党和边区民主政治的好处，将其中的进步分子发展为党员。二是对宁夏国统区的社会名流、绅士、中下级军官、政府工作人员等进行调查了解，选择对象，建立关系，并通过他们对马鸿逵统治集团上层开展工作。1943年2月，因边区开展整风运动，金灵工委停止活动。

1945年夏天，为了进一步开展对宁夏方面的工作，中共三边地委分别在盐池县二区余庄子、五区红井子和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三段地，建立了三个工作据点。其中红井子据点由何广宽负责。之后又成立了中共河东工作组，组长赵文獻、副组长梁大均，成员何广宽，统一领导余庄子、红井子两个据点(1945年12月据点发展成为工委)的工作。截至1946年2月，河东工作组在宁夏马管区共发展共产党员131人，分布于马管区的11个县。在中上层人士和军队、政府中建立统战关系70多人，并选派一批优秀党员回宁夏工作，为党在宁夏马管区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国内战争，红井子和余庄子两个工委马上开始招兵买马，建立武装组织游击队。当年冬天，何广宽率红井子游击队两次突入宁马统治的里山堡等地，摧毁了那里的反动组织，俘虏了多人。延安《解放日报》以显著位置报道了《我何广宽部向下马关一带出击》的消息。

1947年6月，奉中央西北局指示，红井子、余庄子游击队和定边盐场堡的回民游击队，三股武装力量合编为由中共宁夏工委和三边军分区双重领导的回汉支队。回汉支队

初建时共有234人，其中共产党员47人，回民65人。

1947年3月，宁夏马鸿逵部配合胡宗南进攻延安，发兵3万余人进攻三边地区。大敌当前，三边地委决定扩大回汉支队编制，成立“宁夏人民解放军”。由赵忠国(孙殿才)任司令员，邓国忠任政委，梁大均任副司令员，刘振玉任参谋长，何广宽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刘振玉兼任支队长，梁大均兼任政委；第八挺进支队由金三寿任支队长，何广宽兼任政委。支队下各设三个中队，人员发展到350多人。7月初，宁夏人民解放军番号取消，恢复回汉支队建制。

在“宁夏人民解放军”阶段，何老参加并组织领导了大小多次战斗，他的勇敢和机智，多次受到同志们的称赞和上级表扬，并几次代表部队去执行特殊的任务。1947年6月，得悉西北野战军获得陇东大捷后，他和金三寿等奉命从吴旗三道川出发，到陇东前线向彭德怀求援，使宁夏人民解放军在武器装备上得到大量补充，并且应彭德怀、习仲勋、张文舟等领导同志的要求，详细汇报和分析了三边地区的战争形势，供领导同志指挥部署战斗参考。

1947年6月29日，宁夏人民解放军在吴旗头道川和西野二纵队相遇。二纵司令员王震将军来请何广宽和梁大均为二纵队作报告，介绍了宁马军情及三边的形势。接连报告两场，王震司令员夸赞“讲得很好”，并以贵客的礼节招待他们，还向她们要去了3个回民干部，作为对大部队的支援。

1947年8月以后，何广宽奉命离开部队，再次回到红井子工委开展工作。1948年5月在回汉支队的帮助下，红井子工委再进里山堡区，建立了里山堡区乡人民政府。当月，回汉支队又收复了环县甜水区与同心县堡区，成立了甜水区中心区，辖里山、甜水、堡区三个区，作为宁绥工委向宁夏开展工作的依托。(未完待续)

珍贵记忆

忆宁夏著名秦腔演员杨觉民(上)

闫世杰

国家一级演员，宁夏秦腔剧团离休老艺人，曾任银川市政协常委、自治区政协委员、自治区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的杨觉民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于2006年9月6日下午4时不幸逝世。我是他的老友，也是他的戏迷，当时我不在银川，没见他最后一面，深感内疚。值此周年之际，撰文祭奠，追悼友情。

杨觉民从1935年开始登台唱戏到1982年光荣离休，舞台生涯47年。他离休后离而不休，经常应邀参加大型演出活动。如1985年觉民学社成立50周年、198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等活动的演出，直至1998年抗洪赈灾义演后才最后告别舞台。他的舞台生涯实际上超过了60年。他一生演出剧目162本，其中主演剧目112本，代表剧目62本，共5000余场。在现大剧《人间天上》中，他演唱的陈代勇唱段由中国唱片公司录制，于1958年发行全国，1959年第7期《戏剧报》作了介绍。《宁夏日报》《宁夏画报》等报刊对他的艺术成就多次报道并配发剧照。

杨觉民的艺术生命之长，演出剧目和场次之多，表演艺术之精，群众影响之大，在我区演艺界是首屈一指的。他用辛勤的汗水和出色的表演，为活跃城乡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繁荣和发展秦腔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宁夏乃至大西北提起杨觉民不知者不多。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任第一书记杨静仁就曾称赞说：“宁夏父老就连3岁的娃娃都知道杨觉民。”当时在宁夏流传着一则笑话，剧团下乡在山区演出时，有老两口要看杨觉民的戏，到票房去买票，说买两张杨觉民、屈效梅。

一

杨觉民，祖籍陕西省长武县，

1921年1月10日出生。1925年随父母逃荒到甘肃平凉北门外安家磨村。1929年(民国十八年)其父在大灾荒中饿死后，母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改嫁赵姓。因为赵家的打骂虐待，杨觉民逃出赵家到一个戏班子里学戏。这个戏班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连肚子都混不饱。不久他又到一家客棧茶房去烧水，有空了还到那个戏班子里去，和穷哥们唱唱戏，练练功。

1935年5月，从陕西过来了30多个十几岁的男娃娃住在客棧，和他们一块玩耍时，听说是从陕西招到宁夏学唱戏的，他听后真高兴。经过苦苦哀求和软磨硬泡，取得了带队的同情和默许，与那30多个男娃娃同车来到了“宁夏觉民学社”。第二天，这些男娃娃被集合起来，按大小个子排成队起名字。其实名字是按“中、华、民、国”四个字早就定了，喊到谁这个名字就是谁，杨觉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觉民学社成立于1935年3月，它效仿西安易俗社“提倡文艺、移风易俗、普及社会教育、改良秦腔艺术”的办社方针。这是宁夏历史上第一个班校合一的秦腔表演教育团体，标志着宁夏秦腔把舞台实践与艺术教育相结合的开始。觉民学社从1935年成立至1949年宁夏解放的15年中，共招收了甲、乙、丙、丁、戊五期学员200多人。杨觉民文武小生，他的嗓音洪亮、吐字真切、眼神灵活、面部表情丰富，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一时期他在《股桃娘》《紫金冠》《蝴蝶杯》《黄鹤楼》《周仁回府》等传统历史剧中成功地塑造了韩信、吕布、田玉川、周瑜、周仁等许多英雄豪杰和忠诚义士的形象，名声大噪。但是，在旧社会戏子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与剃头的、修脚的、裁缝、吹鼓手等同被列

为“下九流”，他们的生活待遇和士兵一个样，吃的是官仓粮，穿的是粗布衣，点名不到都要被送公安局。杨觉民多次被关押过。一次还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白玉光(宁夏解放后任民政厅长)关在一个号子里。

当时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是个秦腔戏迷，觉民学社既是他的摇钱树(票房收入全交财政)，又是他消遣娱乐的场所。觉民学社有演出，一般他都要去看。他不到场不能开戏，有时得等他几个小时。他看起戏来没完没了，有一次连看了两天两夜。演员们台上轮流吃冷饭，他在台下摆筵席。演出中谁如果出一点差错就不得了，总得让校长教训一顿，非打即骂。

二

1949年9月23日，塞上古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共产党万岁”“欢迎解放军”的标语横幅星罗棋布，列队人群众号声此起彼伏，欢庆银川市和平解放。

人民翻身做主人，昔日的戏子成了文艺工作者。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下，1950年4月在原觉民学社的基础上新成立了“银川剧社”，杨觉民当上了社长。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指导下，银川剧社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史无前例地吸收和培养了“四梅”，即屈效梅、王素梅、孙玉梅、赵友梅，改变了秦腔传统的男扮女妆，为宁夏的秦腔戏剧注入了活力。为配合当时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新排练上演了《志愿军的未婚妻》《一贯害人道》《模范农家》《双推磨》等一批现代戏和有反霸斗争意义的《猎虎记》《红娘子》等历史戏，受到群众的欢迎。

知青在宁夏

难忘的东全一队

尹俊苓

那是一个生活在今天的人不能够理解的岁月，大多数青年学生品学兼优，但是因为父辈的家庭，我们被定为“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高中或者大学拒绝录取我们。于是，我们的出路就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5年和1966年，939名杭州知青就这样从杭州来到宁夏永宁县插队落户，做新一代的农民。

安排在养和公社东全一队的是我们8个清一色的女生，其中6个人当年是15岁，两个是16岁，8个稚嫩的女孩大多都还没有发育好，个子又瘦又小。写这篇文章的前几天非常巧地和我们队的赵婉平、王晟刚、吴金英等人见了面，吴金英当年个子最矮小，最多只有156厘米，在分别40年后我们相见时她竟长到166厘米。

至今我还记得当地老乡看见我们时那种相当爱怜的目光，他们注视并且不断询问我们，他们搞不懂，为什么我们年龄这么小，父母会舍得让我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插队？

我们有两间住房，4个人一间齐排排睡在一个大炕上，我比她们大一岁，无形中担任了她们依靠的大姐姐角色。每天晚上都有些害怕，起夜时她们一准会叫醒我，让我起来帮她们把煤油灯点燃……

生产队对刚来的我们关怀备至，最初的一个月，队长安排了一位大娘为我们做饭，到今天我似乎还闻得到大娘为我们煮的永宁大米饭的香味。可是往后的日子我们自己动手就惨了，我们吃了相当一段时间伴着鱼味的面糊糊和大块大块的面疙瘩。我们开始了地里的劳作。每天天蒙蒙亮时就和社员一起下地，下午等到太阳下山时收工，回到知青点后再自己做饭。麻烦的是一个月下来，多数社员不同意给我们记成人的工分，他们认为应该给我们记“娃娃分”才对，因为我们本身也就是几个没有完全长大的娃娃。成人工分是10分，娃娃只有5分，如果按照“娃娃分”记，劳动一年下来，我们都养不活自己。

庆幸的是我们这939名从遥远的杭州来到塞外的知青们，从一开始就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县委书记史玉林是我们的校长，很多细微的地方都是从上到下布置并且打过招呼。所以最终生产队还是给我们记了成人的工分。既然是成人工分，挖渠的时候是用铁锹把来量长度的，社员挖多长我们也得挖多长，这样的劳动强度，我们8个知青里大多数人是绝对完成不了的。可是我是个好强的人，便拼着命去做，但是每到最后还要靠村里几个强壮的小伙子帮我挖上几锹才能够完成。我的好强赢得了社员对我的尊敬，却也让我累坏了腰骨，从此不能够负重，腰痛伴了我一生。

每天周而复始“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生活着，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时累得什么话都不想说了，偶尔拿起书本就会觉得前途一片迷惘。

看到眼前已经泛黄的旧照片，45年前的点点滴滴像拼图一样在脑海中聚集，无论离开多久，无论走得再远，宁夏永宁永远是我们梦魂萦绕的地方。因为那里是我们青春洒落的地方，无论酸甜还是苦辣，再苦再累，我们的人生都是从那里扬帆起航的。

2008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庆祝50周年大庆时，我有幸回到阔别了几十年的宁夏，接待单位问我最想去什么地方，我说：“我想回我的生产队！”沿着高速公路从银川出发，我只觉得一瞬间就到了永宁，昔日我们在黄土飞扬中骑自行车经过的土坯房，如今变成了一座无比漂亮的村庄。

我在东全一队搜寻我们知青点和我梦中的白杨树，社员告诉我那里正是现在高速公路经过的地方。我问他们还认识我吗？他们腼腆地笑笑，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趣味。一切都成为了过去，过去的一切真的就如眼前泛着黄土地一样黄的照片，而今天绚丽斑斓的一切更像是一幅美丽的彩色照片。

由衷的喜悦带着我对第二故乡宁夏永宁县的祝福，久久在我心里重复：希望宁夏人民永远幸福，自治区繁荣昌盛。